

◀（上接 4 版）

变,行动策略上也应有所改变。以往强调城市内部资源的集聚,现在注重城市外部网络的连接,因此,我们的目标不再是单纯地积累财富和资本,不再是一味地追求 GDP 规模,而是要发展城市的服务功能、平台功能和连接功能。城市的发展不再局限于上海市域内的功能配套,而是要融入区域一体化,寻求区域内的功能互补和配套,并且在全球城市区域或巨型城市区域中来确定上海发展的核心功能,动态地疏解城市的非核心功能。从战略角度来看,我们对外的网络联通度虽大,而大部分是外部引入的连接,自发触动的连接相对较少,很多平台包括大的市场,能级较低,我们离卓越的全球城市这个目标远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尽管全球城市演化有它自身的规律,而夯实基础始终是必要条件,而我认为核心的基础是优化营商环境。一个好的营商环境能够吸引各种全球性的功能机构和公司集聚于此,全球城市的能级恰恰是靠这些机构和公司的集聚程度来实现的,如果没有好的营商环境,即使其他条件,比如区位条件、硬件设施等再好,机会来临之际,也无法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网络不同于一般社会网络,它是一个三层结构的网络,而全球功能性的机构和公司是其中最主要的一层,因此吸引这些机构和公司就成了最关键的问题。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人才。过去,人才随着机构和公司走。这样的局面已经改变,全球竞争日益转向人才竞争,因此,在营商环境中,吸引人才的环境和条件显得日益重要,而吸引人才的主导因素是他们能否在这座城市里获取更多发展机会,获取更多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倒并不主要在于城市为其生活提供了多少便利。

至于如何发挥战略优势,需要改变以往补短板的管理学思维,转而拉长板,把城市的核心功能做大做强,非核心的功能则有序地疏解出去,在长三角的城市群中实现功能互补和综合配套的格局。上海现在提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际上是建立全球城市过程中的战略布置,而这一布置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无法在上海的市域范围内实现目标,打造卓越的全球城市,必须将上海置于全球城市区域当中。

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必须具备强大的吸引力、创造力和

影响力,所以如何打响上海的城市品牌,需要提高到全球城市功能的层面。现在上海提出的“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这四大品牌,这些都要放到如何增强全球城市功能的层面上来考量。

最后,从谋划和实干的角度来说,上海的城市建设要顺应全球城市发展新趋势,紧扣中国崛起的步伐。全球城市本身也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化而动态演化的过程,今天,上海、纽约、伦敦等进一步提出“科创中心”或“文化大都市”等规划,这就说明城市发展的未来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功能,而是更加综合的功能。与此同时,中国崛起的速度很快,上海要适应这种快速的变化,配合国家战略的需要,大胆创新,高速发展。

全球城市最核心的逻辑是中介化

权衡:感谢周振华教授的精彩演讲,下一位演讲者是“全球城市”概念的提出者萨斯基娅·萨森教授。萨森教授是当前全球化和全球城市研究领域最知名、最活跃的专家之一,1991年出版的《全球城市》首次提出了“全球城市”的概念,这一定义至今仍被学界和政策部门广泛接受。今年8月,萨森教授《世界经济下的城市》一书的最新版本将由著名的学术出版社 Sage 出版,而周振华教授新近出版的《全球城市》的英文版同样将由 Sage 出版。学术界和出版界交流互动,一方面把国外研究城市的学术前沿成果引进来,同时也想把中国的最新研究成果推广出去。

十多年前,上海社科院举办过一个城市研讨会,萨森教授和周振华教授在那次会议上就全球城市的发展提到了很多精彩观点。我印象最深的是,全球城市和服务业发展的背景下,收入分配的发展趋势。全球城市发展受服务业分化的影响,收入的不平等和差距会扩大,如果这个假说成立,或许就可以解释经济学中的库兹涅茨倒 U 型曲线的后半段在很多国家没有发生的原因。库兹涅茨假说为什么没有存在,全球城市的理论框架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下面我们有请萨斯基娅·萨森教授发言。

萨斯基娅·萨森:感谢您的介绍。我记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全球时代刚开始的时候,



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后,长三角地区的来往更为便利。

没人预想到城市会成为主要的驱动剂。说到全球,一个国家的任何一方面都有可能是全球的,城市可以是全球的,很多其他要素都可以被视为全球的。谈到城市,人们认为城市是复杂而不完整的系统,在复杂与不完整的条件下,城市有不断学习的能力,它能不断吸纳,而你不知道它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正体现在城市的变化中。同样有趣的一点是,当我们回顾 30 年来的历史,发现全球化正在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刚才谈到了不平等性,平等与公平是不一样的,在复杂的城市中,你可以寻求平等,而公平是难以实现的。我目前正在做城市道德方面的研究,城市中大量突出的差异和不同,使得城市成为了一个有趣而复杂的空间,在城市的空间范围内,道德和伦理被认为是完美的事物,但实际上没有城市是完美的。所以,我们如何使得城市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有自己的生命和希望,都有自己的工作与追求,我们面临的挑战绝不是简单的平等问题。

我第一次来上海是在 1978 年,我走在社区中,晚上没有路灯,唯一的光源来自一户人家打开的门。我将永远记得那时的上海。回到全球城市这个问题,谈到全球城市,我本人在研究中比较关心的是中介化。什么是中介化呢?以西方为例,当全球化发生的时候,是城市占了主导地位,是城市在唱主角。北美和欧洲有一些历史悠久的大型公司,这些大型公司以前也都是包办所有事情,用最低层次的工人,也用最高层次的白领,“自己人”各司其职。在全球化浪潮里,它们清楚自身无法完成所有工作,而需要更多更专业的辅助,这样,中介产业就慢慢出现了。假设一家欧美大公司在 70 个国家运作,某些行业和基础设施依然是本

土化的,但它们可能需要 50 个蒙古会计师、20 个阿根廷律师,等等。中介行业可以在此过程中提供很大一部分服务,沟通全球范围内的需求,并提高效率。所以对我而言,全球城市最核心的逻辑就是中介化。

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当全球城市出现的时候,很多城市并不富裕,比如纽约和伦敦,都快破产了,巴黎也非常贫困。所以,当城市的全球功能出现时,某一个时间窗口就出现了。这些城市既想要加速全球化,同时又希望抓住这个机会增加收入。

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集中了一批在行业中非常专业的人群,他们能够提供各种各样的知识型服务。虽然并不提供全部的服务,但这种服务能力非常重要,它意味着将有一大批知识领域的企业应运而生,然后完成各种各样的细分任务。当然这个进程是要付出代价的,有些行业会衰落,而有些行业会越来越赚钱,越来越有前景。这个过程虽然显得非常残酷,但在纽约、伦敦和东京等全球城市,确实都如此。

我之所以提到这三个城市,是因为,我曾研究多个不同的经济产业,分析这些产业是如何出现的。我在洛杉矶和纽约工作,但我想我应该去一下东京,去一下伦敦。后来,在这样的实证研究中,前述三个城市浮现出来,于是我更深入地研究了这几个城市。有些城市在应对挑战的时候比其他城市更加优秀,在我看来,纽约市可以说是面对挑战最糟糕的,我感谢美国有非常优秀的大学,但作为美国公民,我对美国政府在任何公共领域处理挑战的方法都非常不满。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不同的城市在应对挑战的时候有非常大的差异,这体现了它们全球功能定位的差异。

我不是一个浪漫的研究者,我每次来中国,其实都带着批判的眼光。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要对面临的风险拥有足够的警觉。全球城市的确创造了财富的集聚,而财富的聚集往往是风险所在之处,包括社会公平和社会的合理运行等。其实有些方面中国比美国应对得好得多,当全球化进入到一个国家,进入到国家经济层面的时候,它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而好的政府可以让全球化的力量发挥积极的作用,反之则会增加风险。每当发生负面事件,卓越的政府可以引导它往好的方向发展。但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很好地应对和运用这些力量,这些力量反倒会成为负作用。

我的最后一个观点是关于全球城市中我本人很喜欢的部分——进入全球网络并不意味着你要有很多钱,穷人也可以进入一个开放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城市是非常好的。我很高兴的是,看到上海重视这方面的发展。感谢大家。

权衡:非常感谢萨森教授,讲了很多全球城市好的方面,同时也讲到了今天我们全球城市面临的挑战,这有助于我们思考上海的城市发展规划。我们提到“卓越的全球城市”,这也让我们思考,如何规避全球城市的一些问题和不足。萨森教授最后提到的其实是包容性和开放性,这也是全球城市的特点,同样值得我们思考。下面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吴志强教授发言,他是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总规划师。

吴志强:我在同济大学研究城市和区域联动,所以我比较关心全球城市和全球区域

（下转 6 版）➡